

# 刑事证据印证模式省思：理论、运作与规制

王瑞剑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要：**刑事证据的相互印证是我国刑事诉讼独特的证明模式。从理论探讨的角度来看，目前针对印证模式的探讨大多局限于审判阶段静态化的视角，罕有放眼于印证模式各阶段动态化的审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据的印证模式具有着三种样态，分别为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产生、证据确定及证据使用。刑事证据的相互印证虽颇为合理，但也有弊端。因此，从产生阶段、确定阶段、使用阶段多角度对现有制度进行规制，有助于刑事证据印证模式的优化转型。

**关键词：**印证模式；刑事证据；运行样态；印证证据；完善路径

**中图分类号：**D91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 (2018) 01-0061-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8.01.010

## Study on the Mode of Confirmation of Criminal Evidence: Theory, Operation and Regulations

WANG Ruijian

(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875)

**Abstract:** The confirmation of evidence is the mode of proof in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From the view of theory, the discussions towards the mode always take a static view, limiting within the trial stage with a dynamic view. Based on this, in the criminal proceeding, the confirmations of criminal evidence include three modes, i. e. the production, ver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The confirmation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partly reasonable, but many defects are still found. Therefore, the present rules should be regulated from the above three modes to improve the optimization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firmation.

**Key words:** the mode of confirmation; criminal evidence; pattern of operation; mutual verification of evidence; perfecting path

### 一、问题之提出

诉讼证明是诉讼的核心活动，诉讼争议的解决取决于证明活动的完成情况。<sup>[1]</sup>这一核心地位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尤为明显：刑事诉讼的证明不仅作用于审判阶段，还与审前各阶段相对应，并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在刑事诉讼中，通过法定程序下的证明活动，刑事诉讼各主体通过收集证据、确定证据、使用证据等一系列活动，藉以发现案件真实，保障权利。证明模式是证明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范畴，它是指实现诉讼证明的基本方式，也即刑事诉讼活动所采用的审查判断证

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方式。<sup>[2]</sup>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工具，证明模式在历史上多有变迁，目前各国通用的、理性的证明方式是自由心证模式。但由于各国的制度传统、司法环境不同，自由心证模式在各国又多生变化、各有不同。证明模式与刑事诉讼关联密切，以此为视角可以折射诸多深层次的制度规律，实有探讨之价值。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有学者认为，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印证证明模式”，即不同证据“所含信息”的“相互照应”及“共同性”。<sup>[3]</sup>印证模式理论首创于龙宗智教授，其后理论界多有探讨：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多属于深化型研究。

收稿日期：2017-06-17

作者简介：王瑞剑（1994-），男，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证据法学研究。

对目前的理论进行梳理,针对印证模式的探讨主要着眼于审判阶段,虽有涉及侦查活动,但也流于形式化的附带讨论。实际上,由于证明活动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始终,证明模式的探讨也应开拓“理论版图”,聚焦于审前阶段。可见,目前印证模式理论的视野仍过于局限,未有基于刑事诉讼整体的理论观察。基于此,笔者尝试着对刑事证据印证理论做一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观察证据印证的实际运行样态,以期对我国刑事证据印证模式进行针对性的规制。

## 二、理论之展开:印证模式的理论转型

理论并非真实的世界本身,而仅是对几个变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sup>[4]</sup>视角的不同决定了变量的不同,进而也影响了理论的展开。现有的理论探讨主要针对审判阶段,探讨的是印证的规则与方法及其在审判中的应用,采用的是静态的、局部的视角。而动态的、整体的视角则需要放眼于刑事诉讼整体,对印证模式各阶段进行动态化考察。因此,印证模式理论需要实现视角上的转型,从局部到整体,从静态化到动态化。

### (一) 印证模式的静态观感

印证模式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已历经十余年的探讨,理论的框架与内容均已达成一定共识。在理论范式的转型之前,对现有理论进行一番概览是深化讨论的基础。在讨论印证模式理论之初,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着眼于其方法原理,论证其意义及合理性。<sup>[5]</sup>其后,学界还普遍关注印证证明的规则与方法,一般认为,刑事证据印证是指两个以上的证据在所包含的事实信息方面发生了完全重合或者部分交叉,<sup>[6]</sup>其主要包含作为证明力的印证与作为证明标准的印证。<sup>[7]</sup>以此为基点,实务界还探讨了印证规则的实践运用,其中既有普适性的分析,也有针对个案、类案的类型化分析。印证模式虽然颇有其合理性,但在制度上仍存在着诸多局限,因此致力于对印证模式改革完善的探讨也屡见不鲜。

总体而言,目前针对印证模式的探讨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对印证模式的基本原理进行理性思辨,对其原理、价值及合理性作出界定;其二,对印证规则的规范性思考,探讨审判阶段的规则适用

与实际操作;其三,针对印证模式的不足之处进行理论反思。

### (二) 印证模式的动态考察

静态视角较为全面地剖析了印证模式,但却忽略了印证模式的动态变动过程。正所谓“不把特殊事实置于一种普遍性的前后关系中,特殊事实是完全靠不住的”<sup>[8]</sup>。印证模式既然内嵌于刑事诉讼,就绝非凭空出现,而必然受到各方刑事诉讼活动的普遍影响。印证模式虽以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为旨归,但却并非以此为唯一内容。相反,在静态角度进行充分观察后,用动态视角观察印证模式不可不谓是另一种有益尝试。动态视角下的印证模式以用于印证的证据为研究对象,将印证证据的产生、确定与使用均纳入研究范围。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动态视角尝试着将印证模式视为一个过程,从印证证据的产生,到印证证据的确定,再到印证证据的使用,藉以全面观察印证模式运行的全过程。印证模式不仅是审判阶段据以审查某一证据或全案证据的重要工具,更是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的一条主线。依托于动态化的视角,印证模式契合于渐进推动的诉讼过程,可得到更为合理的界定。而从制度层面来看,诸如侦查阶段以印证为目标所实施的证据收集,审查起诉阶段所实施的证据确定,也只有呈现于动态的诉讼过程,纳入印证模式的范畴,才更有利于理论的深入。可见,随着诉讼进程的推进而产生变动的印证模式,已不可避免地要具备整体的、动态的属性。由此,理论范式的转型不仅有其可能,更具有其必要。

## 三、模式之运作:印证模式的三种样态

以上述理论转型为基础,刑事证据印证模式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呈现着不同的运行样态。从动态化的视角切入,印证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诉讼进程相契合。作为印证模式的作用对象,印证证据历经产生、确定与使用各阶段,并相应呈现着不同的样态。

### (一) 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产生

印证模式是针对刑事证据的印证,其落脚点在于不同刑事证据之间的“重合”。正所谓“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证据的印证也首先来源于证据的发现。从印证模式的动态化演进来看，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产生是模式运作的第一步，对印证的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印证模式的影响下，肇始于侦查阶段的证据收集无不带有着“印证”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又有如下两种表现：

其一，以口供收集为中心。刑事证据印证模式对口供极其依赖。一方面，印证的证明结构往往以直接证据为中心，而口供因其信息量大而必然是“最佳印证证据”<sup>[9]</sup>；另一方面，实践中法官偏重对口供的采信，“零口供”不仅难以得到证据印证，更难以有效定案。由此，口供的收集在印证模式下的证据集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进一步演化成“口供中心主义”。这一现状实际上是印证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其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危害：首先，口供的真实性存疑，极容易裹挟有关证据“带病”进入审判阶段；其次，直接催生刑讯逼供，有违程序正义。

其二，违法取证丛生。印证模式下证据收集的另一表现点在于违法取证具有充足的内生动力与生长空间。为了达到相互印证的效果，除获取口供外，侦查机关往往需要额外收集一些印证性证据。<sup>[10]</sup>这一制度的必然趋势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侦查机关“铤而走险”，采取违法的取证手段；第二，侦查机关“无中生有”，炮制虚假的印证证据。这两种后果绝非“天方夜谭”，在实践中早已有所反映，如在杜培武案中侦查机关为了印证而虚构的尸检报告、气味鉴定、泥土鉴定等。<sup>[11]</sup>违法取证而来的证据在真实性与合法性上天然不足，极容易成为印证模式中“被污染的水源”。

## （二）印证模式下的证据确定

经过侦查阶段证据的充分收集后，要使证据能最终进入审判阶段并成为定案的根据，还需要经过证据的确定。不同于证据的收集，证据的确定包含证据的选择与证据能力的审查。只有经过双重机制的筛选，得以确定的证据方可最终进入印证证据的使用阶段。由此看来，证据确定环节在印证模式中具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从实际运行来看，这一阶段同样具有着相应的缺陷。

其一，证据确定的范围局限。在印证模式的推进过程中，侦控方完全主导证据的确定，往往会为了片面追求印证而对收集的证据进行筛选。在这一过程中，有罪证据会受到异常的重视，而无罪证据或是与有罪证据相矛盾的证据则会被天然忽略。同时，得到印证的证据之间还会形成严丝密合的“印证之网”，自动排斥可能出现的“合理怀疑”。这一现象反映了印证模式下证据确定的范围局限，折射了印证模式固有的思维方式。由此，在证据信息局限、无罪证据被过滤的情况下，有罪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很有可能掩盖本应有的“合理的怀疑”<sup>[12]</sup>。

其二，证据能力的审查缺失。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是自由心证下的产物，其推定相关证据具备证据资格而不加以审查。由此，在确定证据的阶段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并将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排除在外，是确保证据印证行之有效的关键步骤。然而，我国印证模式缺少了前提性的证据审查，难以保障相关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结果，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贸然”进入证据的使用过程，进一步加大了印证出错的概率。

## （三）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使用

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使用是传统理论探讨的核心领域，也是证据互相印证的最终环节。在证据使用环节，印证规则或运用于对某一证据证明力的检验，或运用于相关证据是否得以定案的判断。总体而言，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使用依赖于案卷笔录的相互验证，并在证明力的检验与证明标准的判断两个角度上发挥重要作用。

其一，依赖于案卷笔录的印证。案卷笔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审判阶段，无论是法庭调查抑或辩论，实际上均是以控方提交的案卷笔录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sup>[13]</sup>。作为这一现象的衍生品，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使用实际上也仅是案卷笔录之间的相互印证。而经过产生阶段、确定阶段的印证“洗礼”，证据使用阶段的相互印证早已不言自明。进言之，在案卷笔录本身未得到审查的情况下，片面依赖笔录中的印证不仅真假难判，其意义更是有待质疑。

其二，作为证明力检验的印证。证据印证的第

一项功能在于对某一证据证明力的检验,尤其是针对庭审中翻证、翻供问题。<sup>[14]</sup>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当出现翻供、翻证的情况时,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证言、供述往往会被法庭优先采纳。但由于庭前证言、供述基本已处于控方严密的印证体系中,实践中的审判印证便异化为如何推翻庭审证言的证明活动。实际上,“从心理的角度而言,当面撒谎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远远超过非当面指责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sup>[15]</sup>。因此,对于证言、供述的庭前、庭审差异,本应通过“师听五辞”以达致内心确信。但将相互印证的或然性经验普适化并上升为一般规则,可能会造成实践中机械化地适用规则,反而适得其反。

其三,作为证明标准判断的印证。在印证模式的作用下,原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异化为片面追求“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这反映了印证模式下的证据标准判断从主观到客观,以形式理性代替实质理性的趋势。形式化、客观的证明标准在实践中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没有印证的形式纵形成内心确信也不敢定案,而有印证的形式纵难以确信也敢定案。<sup>[16]</sup>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以杜培武案、聂树斌案为代表的所谓“铁案”,实际上都基于形式上的相互印证而被草草定论。总体来看,印证模式下的证明标准造成了裁断者的无所适从,面对疑案贸然决断,面对真正的铁案却游移不决。

#### 四、制度之规制:印证模式的完善路径

对印证模式的理论观察是解决问题的开端,其最终尚需落实于制度完善的层面。诚然,证据的相互印证确有其合理性,<sup>[17]</sup>但这种合理性必须要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前述对印证模式运作样态所做的阶段区分,不仅是观察制度缺陷的合适视角,还可作为制度完善的切入点。

##### (一) 产生阶段的规制

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产生阶段是单方化、封闭化的阶段,也是权利最易遭受侵害、违法取证最为高发的阶段。正如前文所述,口供中心主义以及违法取证频发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虽然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绝非易事,但有几个要点仍需引起注意。总

体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被追诉人供述的自愿性问题;二是侦查机关的权力制约问题。

##### 1. 健全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

供述自愿性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追诉人作出认罪的供述,应当做到内心确信,不得受到胁迫或者欺诈;二是被追诉人应当获取相当的信息,以供其作出自愿的选择。与之相对应,对自愿性的保障需要从沉默权规则的建立与律师帮助权的角度入手。首先,沉默权的基础在于保证被告人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sup>[18]</sup>若要使被追诉人不受胁迫而平等对话,需要进一步建立我国的沉默权规则,赋予被追诉人以实质性的沉默权。其次,完善被追诉人的律师帮助权。虽然被追诉人名义上享有认罪或不认罪的绝对权利,但是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其根本不享有任何保护。<sup>[19]</sup>因此,侦查机关需要保证被追诉人与律师之间的充分沟通,同时还需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为未聘请律师的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援助。

##### 2. 创设权力的外在制约机制

侦查阶段的单方化与封闭化是侦查机关掩盖违法取证的有效工具,极易催生“有害”证据。要祛除这一弊端的有效路径是推动侦查阶段的适当开放化,促使不同的诉讼主体参与其中,构建侦查权的外在制约机制。从我国现有的改革趋势出发,制度完善可以采取如下两点:(1) 律师的参与。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改革方向是逐步增强律师在审前阶段的作用:1996年刑诉法修改将律师的介入提前至侦查阶段,2012年刑诉法修改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资格。<sup>[20]</sup>因此,下一步制度完善应当从帮助到有效的帮助,确立辩护律师有限的在场权。辩护律师的在场不仅能有效缓解被追诉人的压力,也能制约侦查力,抑制违法取证。(2) 检察机关的介入。在侦查阶段开放化的基础上,需要明确检察机关介入侦查阶段的必要性,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案卷形成的有效影响。目前来看,建立“检”领导“警”的机制并不现实,但可以推动建立“检”引导“警”的工作模式,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作用。

##### (二) 确定阶段的规制

证据的确定阶段是印证模式之中的过渡阶段,

发挥着证据过滤与证据审查的功能。然而，目前的制度安排不仅未能过滤出全面的、合法的证据以供印证，相反，在印证思维的影响下，对证据能力不加审查，甚至排除无罪证据。对此，确定阶段的规制需要从转变证据确定的思路以及加强对证据能力的审查两个方面入手：

其一，强化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在审查起诉阶段，确定用以公诉的证据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之一。对此，要使可供印证的证据更为全面、充分，必须要重申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所谓的客观义务是指检察官超越当事人立场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义务。<sup>[21]</sup>落实于证据确定阶段，客观义务要求检察官必须客观公正地收集证据，不仅要收集有罪证据，也不能任意排除无罪证据。具体而言，在审查案件事实或证据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保证客观中立的态度：一则对于可能存在的无罪证据不能一味排除而应当审慎考量；二则对于案件中可能存在的疑点，应当及时行使补充侦查权，督促、指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

其二，对证据能力的独立审查。针对前述证据能力的审查缺失问题，应当首先建立对证据能力的独立审查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法官或检察官必须优先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独立审查，将虚假的证据或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排除在外。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对待庭审中出现的翻证、翻供问题，也同样不能直接用相互印证加以排除，而应当首先对证言本身进行独立审查。在独立审查的基础上，只有确保真实且合法的证据进入下一阶段，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印证结果。

### （三）使用阶段的规制

如上所述，从现行制度来看，证据使用阶段的缺陷主要是过于依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重客观而轻主观，重印证的形式理性而轻法官心证的实质理性。实际上，仅仅从制度本身来看，印证模式优于自由心证模式。但凡事过犹不及，过于依赖印证模式不仅无法发挥其制度优越性，反而凸显其弊端。因此，对于印证模式下证据使用的规制，要将印证与心证有机结合，并辅以充分的裁判文书说理，以保证印证模式的合理、有效运行。

其一，印证与心证的有机结合。就证明模式而

言，两大法系虽然发展历程彼此相异，但却殊途同归均采用了自由心证模式。这一趋同绝非巧合，而是刑事司法规律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司法证明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我们永远无法期待制定出一部全能的证据法而使执法者变成“法律的自动售货机”。<sup>[22]</sup>将相互印证的经验法则上升至一般规律，或许能百试不爽，但却难以一劳永逸。也正是这可能出现错误的风险，便如“不公正的审判”一般，污染了“司法的水源”。因此，只有将印证与心证有机结合，主观、客观相统一，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相调和，才能有效弥合印证模式的缺陷，发挥其应有作用。

在对单个证据进行审查时，尤其是在翻供、翻证问题上，不能机械适用印证规则，而应当重视法官内心的心证。在心证与印证的结果出现冲突的情况下，法官要充分发挥其主观理性，甚至以庭上证言为优先。而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时，证明标准更是一个需要法官自有判断的主观标准。对于依靠主体认知形成的判断结果，难以获得具体的、同一的外在标准。<sup>[23]</sup>因此，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仅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而只有结合心证的情况下，才能成其为充分条件。

其二，裁判文书的说理强化。在印证与心证结合的情况，只有辅以充分的说理，才能有效规制法官的裁量权，实现程序公正。正所谓说理是裁判的灵魂，公正的裁判是法律论证和法官说理的过程。<sup>[24]</sup>实践中，不论是文书中“堆砌”的证据条目，还是“无法印证，不予采信”“相互印证，足以采信”的文书表达，均无法满足裁判文书的应有作用。因此，印证模式下的证据使用要求裁判文书的充分说理。公正、充分的说理要求对印证的逻辑展现与对心证的过程公开。对印证而言，裁判文书应当归纳印证焦点，点明为何印证、何处印证；对心证而言，裁判文书应当展开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对案件的疑点进行充分阐释。两者相结合，只有摆脱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的表述类型，才能发挥印证与心证俱备的制度优势。

### 【参考文献】

- [1] 陈卫东，谢佑平. 证据法学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20.

- [2] 韩旭.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的转型 [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8 (02): 108.
- [3] 龙宗智. 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 [J]. 法学研究, 2004 (02): 109.
- [4] 林毅夫. 论经济学方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9.
- [5] 龙宗智. 刑事印证证明新探 [J]. 法学研究, 2017 (02): 150.
- [6] 陈瑞华. 刑事证据法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19.
- [7] 陈瑞华. 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 [J]. 法商研究, 2012 (01): 113-116.
- [8] 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贺卫方, 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 [9] 蔡元培. 论印证与心证之融合——印证模式的漏洞及其弥补 [J]. 法律科学, 2016 (03): 176.
- [10] 林劲松. 刑事审判书面印证的负效应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06): 85.
- [11] 王达人, 曾粤兴. 正义的诉求 美国辛普森案和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123.
- [12] 陈瑞华. 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5: 194.
- [13] 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170-194.
- [14] 陆而启. 智识互转: 印证规范解析 [J]. 证据科学, 2011 (04): 408.
- [15] 李先伟. 证人出庭作证与公诉结果的不确定性 [J]. 人大法律评论, 2013 (01): 233.
- [16] 谢小剑. 边缘化刑事程序研究 被理论忽视的司法实践 [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0: 243.
- [17] 李建明.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性与合理限度 [J]. 法学研究, 2005 (06): 22-24.
- [18] LEVY L W. Origins of the Fifth Amendment: the 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73.
- [19] 乔治·费希尔. 辩诉交易的胜利——美国辩诉交易史 [M]. 郭志媛,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 [20] 田文昌, 陈瑞华. 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33.
- [21] 龙宗智. 检察官客观义务论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 118.
- [22] 汪建成, 孙远. 刑事证据立法方向的转变 [J]. 法学研究, 2003 (05): 24.
- [23] 张卫平. 证明标准建构的乌托邦 [J]. 法学研究, 2003 (04): 68.
- [24] 朱锡平. 融合心证: 对证据印证证明模式的反思 [J]. 法律适用, 2015 (02): 85.

